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

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

乌兰夫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林彪、“四人帮”破坏统战工作和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罪行必须清算，制造的假案、错案、冤案必须平反、纠正、昭雪。讲话就进一步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八个政策问题作了阐述。爱国工商业者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政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的大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座谈会上，大家就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全国工商联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地的一百多名爱国工商业者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政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的大业献计献策、尽心尽力。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主持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党的统战工作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每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每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中央统战部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有力助手。它和各级统战部门，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党中央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上是认真的，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党的统战工作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党的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共产党的政策是说话算数的。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统战工作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罪行必须清算，他们在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人们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乌兰夫同志在讲话中还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八个政策问题作了阐述。（讲话全文见第四版）

乌兰夫同志讲话后，工商界人士兴高采烈、精神振奋。他们在分组讨论中思想解放，畅所欲言。

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说，党落实了政策，我们要考虑自己对国家如何做贡献。我们爱国工商业者都是愿意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的。我们应该在四化献计献策、贡献力量的方面来一个竞赛，除掉心有余悸或者自卑感等思想顾虑，敞开思想讲实话，开动脑筋提建议。我们要帮助国家发掘人才，向政府举荐人才，还要做好在国外的子女、亲友以及国外侨胞、港澳同胞的联系接待工作，并协助有关部门在发展旅游业、服务业、贸易往来、吸收投资、联合举办各种事业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我们也应当尽可能同台湾的工商界朋友恢复联系和往来，首先从通邮通航、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相互访问等方面做起，为祖国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一定要学习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学会新本领，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继续大步前进。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经过党三十年来教育，我们工商界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很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点滴进步总是给以肯定和鼓励。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进步是得来不易的，一定要十分珍惜它，巩固它，并继续努力，取得新的进步。去年夏秋两季，我在上海、南京、成都、武汉等地听到工商界同志们说，在落实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做到合理安排，有利于自我改造，有利于支援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而不可对国家、对家庭和自我改造带来任何不应有的损失和影响，特别是对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以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教育他们，鼓励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说，党中央为了消除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调动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决定发还被查抄的巨额存款和其他财物，恢复和补发高薪，这充分说明党的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党是说话算数的。（下转第二版）

华总理会见托恩首相

华总理说，中国实现四化需要国内安定团结和和平的国际环境

耿副总理同托恩首相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会见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时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内安定团结和和平的国际环境两个条件。

他说：“现在我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我党中央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有差距，但我们有信心赶上。”

华总理说：“国际上有个和平环境不容易。苏联霸权主义手伸得很长，对许多国家进行政治、军事控制。我们看国际局势不是缓和了，而是紧张程度有发展。”

我们大家都必须提高警惕。”

托恩首相在谈话时说，自从他一九七三年访华以来，在中国“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托恩首相说，卢森堡愿意把钢铁工业方面的经验提供给中国朋友们。他说：“中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得到了完全的同情。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冶金工业部长唐克，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光，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参加了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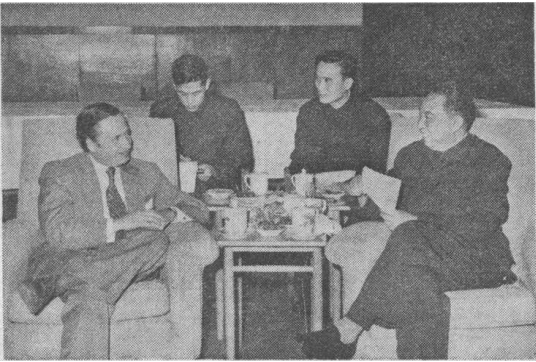
谈话之前，华国锋总理同托恩首相和夫人以及卢森堡其他贵宾一起照了像。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耿飚副总理今天上午同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合作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会谈。双方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对当今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表示了关注。

双方认为，中卢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会谈中，双方在诚挚、融洽的气氛中就钢铁技术合作、民航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华总理会见托恩首相并进行友好谈话。新华社记者 钱钢摄



结束对非洲四国和巴基斯坦的访问

李副总理回到北京

邓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乘专机从昆明回到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一行是在结束对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非洲四国和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后，于二十二日回到昆明的。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耿飚、王震、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井泉，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波，外交部副部长韩念文，外贸部副部长贾石，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

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和巴基斯坦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 勉励老区发扬革命传统

陕西组成代表团赴陕北老根据地慰问

据新华社西安一月二十五日电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组成代表团，前往陕北革命老根据地进行慰问。

由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任团长的陕西省慰问陕北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代表团是月初初组成的，下设三个分团。代表团已分别在延安、榆林、汉中地区，对老红军、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

退伍、转业军人以及广大人民进行了慰问。代表团每到一处，都召开座谈会、慰问大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赞扬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精神，勉励老区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在实现“四化”的历程中争取更大光荣。

与此同时，还下发出生产队五万多份年画和慰问信。信中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老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为革命作过贡献的老红军、老干部、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和烈军属受到残酷打击迫害。加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老区建设进展缓慢，山河面貌改变不大，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老区人民为实现四化，有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立即行动起来，把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尽快建设好。

代表团还在谢子长、刘志丹和“四八”烈士的墓前献了花圈。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

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首先是要发挥我国七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这些重要的政策，体现了我们党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七亿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体现了农民真正是集体经济的主人。持续地、稳定地执行现阶段农村各项重要政策，对于发挥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党的三中全会重申和充实发展的这一系列重要政策，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是有曲折的，前一段比较快，后一段比较慢，有些地方甚至下降倒退。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几年，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妥善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使这一涉及几亿农民的生产关系的大革命，稳定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六二年，《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六十条”）颁布以后的几年，我们在农村的正确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被动局面，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好些地区甚至下降倒退。路线“四人帮”以来，凡是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切实落实党的政策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就迅速好转。去年，在解放以来罕见的干旱灾祸面前，有些省区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夺得增产，或者减少了损失，也是由于党的政策充分发挥了作用。实践证明，我们党的这一系列政策在农村已经深入人心，受到亿万农民的热烈拥护。政策落实了，群众就高兴，生产就顺利发展。正如华国锋同志所指出的：这些政策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正确政策。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农村政策遭到破坏的时间比得到认真执行的时间长得多。值得深思的是：林彪、“四人帮”这一小撮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能量，把农村政策破坏得范围如此广，时间那么长，危害程度如此严重，今天割“资本主义尾巴”，明天搞“穷过渡”，把好端端的农村闹得鸡犬不宁？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有些地方为什么不但继续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批判定额管理，取消评工计分，取代集市贸易，限制家庭副业，没收自留地，搞“穷过渡”，等等，而且公然攻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是“行小惠”，诬蔑群众和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声是“吹冷风”，搞“倒退”根本原因就在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很容易欺骗一些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地反对什么右倾，反对什么复辟，大批所谓的资本主义，折腾个没完没了，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所批判的就是党在农村的正确政策。这就不完全是偶然了：破坏政策的行为，被认为是革命的行动，破坏政策的人受吹捧，被提拔；认真执行政策的人，则被认为是老右倾，老保守，搞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挨批挨斗，罢官撤职。这些极左的说法和做法，使很多干部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恐右症”，使林彪、“四人帮”破坏农村政策的罪行在不少地方得不到有力的抵制，甚至畅行无阻。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好些地方对“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没有认真揭批，“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精神枷锁仍然禁锢着不少干部的思想。有些人因为搞惯了“左”的一套，甚至因此怕得罪人，现在要他们来批极左，当然不容易转过弯子。有些人甚至多少年的经验教训，总把在政策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看做是冒风险的事情，怕再反右。这就在当前落实党的政策的最大思想阻力。当然，前些年的地方确实也存在一些很右的东西，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横行的地方，他们大搞分田单干，投机倒把，盗窃国家或集体财产，贪污腐化等等，那才是真正的在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些真正的东西，理所当然也要进行批判，要坚定不移地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集体经济。

落实农村政策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但也有不少同志还心存疑虑。他们担心现在强调落实政策，不过是解决当前农业生产

发展缓慢的“权宜之计”，几年之后，农业生产情况好转了，会不会又来一次反右倾呢？这种顾虑是有根据的，这是农村政策多次反复的结果，也是“恐右症”的另外一种表现。应当承认，所造成的，我们必须挽回长期以来这种失信于民的弊病，防止“左”倾反复，坚决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党的政策，取信于民。

首先要清除破坏党的政策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顽症。这种顽症已经使我们吃了苦头，教训特别深刻。建议各级党委，广泛地发动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认真地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肃清这种“左”比右好的流毒，使干部和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看一看“左”究竟是比右好，还是同样的害国害民？同时，也应该联系实际，具体分析一下，过去批判的所谓右倾，究竟是真正的右倾，还是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执行政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分析一个社、一个队，甚至一个农民家庭的具体的经历，来认清极左的危害，也是对林彪、“四人帮”搞极左的反革命活动的有力批判。只要把极左批透了，划清了界限，统一了认识，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就能够持续地稳定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要取信于民，必须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在执行政策问题上，一定要是非分明，赏罚严明。要表扬那些执行政策的模范，要表扬那些敢于同破坏党的政策的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对于那些横行霸道、破坏党的政策、投机取巧、升官发财的典型，要坚决予以揭露、批评和处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对现阶段农村的各项政策，党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经济权利受到新宪法的保障，我们正在通过健全法制来保证各项重要经济政策的实现。对于那些严重违法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而不能纵容姑息，否则，我们的政策就不能取信于民。

落实政策事关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各地应当在春耕大忙之前，把党的各项政策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传讲解，让党的政策和广大社员直接见面。把“武器”交给群众，把亿万农民群众动员起来，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使群众敢于起来抵制、批评、揭发和控告那些违反政策的人和事，直至使敌对改正错误为止。这是我们持续地、稳定地执行农村政策的最有力的保证。

人 治 和 法 治

王礼明

在我国长期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的话是“圣旨”，是高于法律的。法律也是由皇帝钦定的，他想要就要，不想要就可以随便废弃。

“四人帮”讲了不少儒法斗争，大讲儒家是反动的，法家是进步的。但是，他们对于先秦儒家和法家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分歧，却是讳莫如深，这就是：法家之所以称为法家，因为他们的主张法治的，而儒家则是主张人治的，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不在法律的有无和好环，而在君主的贤明。“四人帮”不敢讲这一点，因为讲出这一点，既不利于他们自己肆意践踏法制的行为，也会暴露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继承了儒家的反动的东西。

人治为什么不好，法治为什么比人治好？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创始人已经讲出来了。慎到说：“君人者，舍法无以自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君人》就是说，如果不用法治而用人治，一切赏罚杀戮，都由君主的意志决定，赏多少，罪轻重，都由个人说了算，就会造成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下面当然要鸣不平了。《韩非子》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为人主而身察百官，不但在时间和精力上不够，‘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韩非子·有度》)就是说，君主爱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下面就投其所好，照着他的意思去说和做，这只能造成吹牛拍马、阿谀奉迎的风气。所以韩非认为国君只能“因法数，赏罚罚”，“使法择人”，“使法量功”，才能把谗佞之徒赶下去，把有才能的人选上来，国家才能治理好。(《韩非子·有度》)慎到和韩非的这些话，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检验，不能不承认他们是说得有道理的。

不要法治，而要人治，就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理国家的一个人的身上。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大都是昏庸不堪的，当然治不好国家，只能盼出个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当皇帝以后，在贞观初期，注意节俭、谨慎；但是，到了贞观中期，天下已定，他也就骄傲起来了。幸亏他下面还有一些大臣，敢于对他提出劝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魏徵。贞观十三年，魏徵抱着不怕

死(“甘从斧钺”)的决心，上了一道《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对李世民善始而不能慎终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魏徵批评李世民，说他认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所以总是随便动用民力，使老百姓“疲于徭役”。他批评李世民“昵近小人”，“疏远君子”，“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若是”，所以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他批评李世民对于一些有“积年之行”的大臣，动不动就怀疑、抛弃(“或一朝疑而远之”，“或一人毁而弃之”)，使忠义的人日益疏远，钻营利禄的人很快升迁。他批评李世民仗着自己功业大了，看不起前朝和当代的人，“此微之长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称自己的心愿，即使自己压抑一下，听从了谏告，终是耿耿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从而使“亲狎者阿旨(对皇帝的旨意一味阿諛奉承)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魏徵着重指出，他提出来的李世民的这些错误，都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理乱”的大问题。李世民毕竟是个有为的皇帝，看到魏徵的这个奏疏以后，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说：“人臣事主，顺旨甚易，性情尤难”，就是说，人臣对待皇帝，很容易做到一味顺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才是最难得的。李世民把魏徵的奏疏写在己宫内部的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引起警惕。李世民是个皇帝，他的一言一动，别人只能绝对服从(“出言而莫己逆，所为人必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犯错误呢！均引自《贞观政要》卷10) 魏徵这样的人在旁边，时常说些逆耳的话，李世民总算没有犯很大的错误。但是，象李世民和魏徵这样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少了。

搞人治而不搞法治，还有一个弊病，就是容易出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局面(《礼记·中庸》)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不少的。例如，战国时的楚悼王用吴起为相，“明法审令”，取消一部分贵族特权，裁减冗官，奖励耕战，颇见成效。但变法不久，还没有形成一套法律制度的时候，悼王病逝，吴起被楚国的宗室大臣乱箭射死，变法也就失败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效果就不一样。孝公初年，商鞅开始变法，到孝公病死，前后经过二十多年，在秦国形成了一套适合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法律制度。后来，

秦孝公死了，商鞅也被他的仇人秦惠王车裂而死，但“秦法未败”，秦惠王执行的还是商鞅制定的那套法律制度，秦国因此富强起来，后来终于统一了天下。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不可能真正实行法治的封建社会里，也要搞一套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续。

上面讲的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但是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也很有可以借鉴之处吗？我们有些同志总是不大相信法治，他们说：“不要迷信法律”。那末，靠什么呢？靠民主吗？民主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来保证，不过是一句空话，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了。不靠法律，就只能靠“长官意志”。“讲‘不要迷信法律’的人，实际上可能迷信‘长官意志’，所谓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就是要人治而不要法治，它会造成什么恶果？慎到、韩非早已说得很清楚了，近几年来我们的实践也已经再三表明了。“不要迷信法律”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受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人治思想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呢？！

有的同志说，我们也主张人治，我们讲的人治，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就是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任何阶级的统治，总是通过人来实现的，这不是区别人治和法治的标准。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呢，还是应该通过制定和执行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来实现呢？无产阶级承认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只是一个个人，而是集体。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必须实行集体的领导，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能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集体领导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又重新强调了集体领导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党一贯的。如果破坏了这条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就遭到破坏，它会造出什么后果，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集体领导是一条宪法，同样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在领导人不称职的时候可以罢免的制度，人民法院独立地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制度等等，也都是重要的法律制度。只有把这些法律制度健全起来，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才有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一步巩固。

个 检 察 干 部 和 司 法 干 部 的 严 峻 考 验

要同这种人进行斗争，是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的。碰到这种情况，是象董宣那样“强项”不屈呢，还是唯唯诺诺，只顾保全自己，不敢坚持斗争呢？这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株连”小议

隋喜文

“株连”，又名“株蔓”，如树木根株相连，似藤蔓延互牵连。《宋史·张洎传》说：“诸葛公权之乱，郡县株蔓，连逮至数百千人。”“株连”，是封建社会特有的刑罚，是封建君主用来残酷镇压人民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常用手段。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书经》上有“罪人以族”的话，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也就是通常说的灭族。在封建社会史不绝书的满门抄斩、灭门之祸、斩草除根，就是这种惨绝人寰的灭族。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株连的面也越来越广，从灭一族发展到夷三族、夷五族、夷七族、夷九族。从父族到母族、妻族，从同姓亲属到异姓亲属，稍微有点血缘关系的，无不受到株连。因一人犯罪，杀几十口、几百口人，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

后来，这种株连还发展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所谓“灭十族”、“连坐”，就是株连死友门生、街坊邻居的残酷刑罚。明朝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朱棣起草登基诏书，本人被杀，凡灭十族，九族外加门生，共杀八百七十多人。而“连坐”，就更荒唐了，是非亲友，仅仅由于居住地域上的关系，也横被非祸。专制主义越发展，这种野蛮的封建连坐也就越骇人听闻。这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尤为突出。明初胡惟庸、兰玉两案件，“展转株连”，每案被杀一二万人以上，“于是元凶宿将相继尽矣”(《明史》卷132)。明清两代屡兴文字狱，株连也相当惊人。

西方各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封建株连法早就废除了。可是在中国，它却是“僵尸虽臭，招魂有人”。凡是搞反动的，总是受到封建主义的武装寻仇报复，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办法对付人民。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搞联保连坐，差用的就是封建株连法。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当局颁行《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迫使人民五户联合写出连环保结，互相监视、告发，一人违犯，连同办罪。为了篡夺政权，林彪、“四人帮”大搞极为残酷的封建株连。他们在给一些老干部扣造了“莫须有”的罪名以后，往住马上就把株连到家属子女、横加迫害。当然，林彪、“四人帮”搞株连，也绝不仅仅是用来整革命老干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不知有多少人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株连家属、亲友，只要拉上一点关系，就转株连，造成大量冤案、假案、错案。还有许多多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随儿”的青年，也因为受到“株连”，升不了学，就不入了业、入了不入党。林彪、“四人帮”虽然彻底失败了，但是批判封建株连法之余毒，却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强调的一项重要任务。

说“强项令”

于 迟

据《后汉书·酷吏列传》记载，在刘秀当皇帝(东汉光武帝)的时候，曾经把执法不阿、不愿向他的姐姐湖阳公主叩头谢罪的京都洛阳令董宣，称赞为“强项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后，躲到公主家里，地方官吏不敢去逮捕。一天，这个奴仆陪着公主坐着车子出来，被守候在夏门亭的董宣碰上。董宣拦住公主的车子，手里拿着刀，数说公主的过失，硬逼着那个奴仆下车，并当场把他处死。

湖阳公主非常生气，立即回宫去向刘秀告状。

刘秀大怒，派人把董宣找来，要用权杖把他打死。董宣请求他说一句话。刘秀问他想说什么，董宣说：“由于你的威望和权力，刘家的天下又中兴起来，但你的姐姐纵容奴仆杀人，如果不依法把这样的奴仆处死，你将何以治理天下呢？”说完后，以头碰柱，血流满面。

刘秀感到董宣的话有道理，就叫宦官抱住董宣，不让他撞死，但仍要他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不肯，刘秀又叫宦官鞭打他的头。董宣两手撑地，坚决不肯低头。湖阳公主

对刘秀说，“你在没有做皇帝的时候，还能收服罪人，官吏不敢登门搜捕；现在当了皇帝，反不能对付一个小小的洛阳令吗？”刘秀笑着说，当了皇帝和那时当白衣(没有做官的人)不一样了。他很赞赏董宣执法不阿的坚强精神，称他为“强项令”，赏钱三十万。

由于董宣敢于坚持斗争，豪强们感到害怕，京都里的人称董宣为“卧虎”，并且称赞他说：只有董宣才使京都很少出现击鼓追捕盗贼的紧急情况。

董宣虽然是封建官吏，但是，他的执法不

陷于无政府状态；人们生活离开法制，就失去共同规范，就要产生一片混乱。这样，整个社会秩序就必然受到破坏。

社会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阶级敌人的活动要受社会主义法制来镇压，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受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法制，阶级敌人怕它、恨它、破坏它，而广大人民群众则亲它、爱它、保卫它。

林彪、“四人帮”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法制的。在他们煽动下，打、砸、抢、抄、抓的邪风骤起，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们连身家性命尚且不保，哪里还谈得上民主权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法制不存，民主不立。要确保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原载《吉林日报》，本报有删改)

读《曹判论战》的启示

梁凤玉

《左传》中有一篇文章叫《曹判论战》，说的是强大的齐国发兵侵犯弱小的鲁国，鲁庄公决定出兵抵抗。这时，曹判进见庄公，问他凭什么可以齐兵作战。庄公讲了三条，前两条曹判都不以为然，唯有第三条得到曹判的赞同。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意思是说，对于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都不能做到明断无误，也一定要尽力弄清案情。曹判认为这种审判案件时注重调查的作法，是做得好的，是得民心的，可以凭它去作战。于是坚决支持庄公出兵战，结果出现了弱军打败强军的著名战役。

曹判的支持是很有见地的。一个国家没有严明的法制，执法不注重实情，那就不会有清明的政治，就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仗是决然打不胜的。其实，法的重要作用正在于可以打胜仗，举凡社会生活、生产建设，哪一方面能离开法的威力？社会离开法制，就要

《历史研究》今年第一期介绍

本报讯 本期发表黎澍的文章《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早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什么还存在着封建主义复辟的严重现象？出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夺政权这样的历史大倒退？文章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传统思想影响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只有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大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利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深入和完成。

李洪林的《打破禁区禁区》，批判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夺政权，肆意歪曲党史，颠倒党内路线斗争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关系，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搞反革命的大清洗的罪行。文章说，要打破禁区，使大家的思想获得解放，就必须正视党史中的混乱问题，不回避那些尖锐的问题，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李锐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

叙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对孔孟儒家学说，林青黎的进化论，康梁的改良主义等，都有深谈不同的接触和研究。作者说，毛泽东同志从开始产生革命意识之时起，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而是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触人民，接触各种社会实际。

陈汉楚的《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民主》，叙述了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破天荒第一次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情况。文章阐述了被列宁称之为“彻底民主”原则的巴黎公社民主原则的基本措施和精神实质，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夺政权的目，把民主和专政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肆无忌惮地践踏无产阶级民主的罪行。

李晴的《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是一篇同反革命政治骗子陈丕显定李秀成为叛徒的“文章唱反调”的文章。它未发表就被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所扼杀，并被作为作者的“反革命罪行”材料，藏之于档案中达十年之久。文章认为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袖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不失为太平天国和中国近百年史上的杰出人物，农民革命中的优秀军事家和政治家。

论 读 职 罪

王德祥

“四人帮”攀养的一批帮派骨干，更把横行不法当作光荣，把残害无辜当作享乐，把诬告陷害当作晋升的阶梯，这些恶劣的行为极大地腐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今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中，坚持同读职罪进行斗争，有着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它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不惩治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不追究那些由于严重违法或强迫命令瞎指挥，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人的法律责任，就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有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四个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

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读职罪必须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这包括必须负一定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物质责任。所谓行政责任，就是说，凡国家公职人员，不管其地位高，职权多大，都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那些违法乱纪情节较轻，尚未构成犯罪的人，虽然不受国家法律的制裁，但必须受到行政纪律的处分；已构成犯罪的，除了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以外，同时也要给以必要的行政处分，如开除、降级、撤职等等。

所谓刑事责任，就是对违法乱纪，读职犯罪，已经构成犯罪的，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在我国法律中，对国家公职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一些重大的违法乱纪行为如何惩处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滥用职权，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目前正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读职罪如何惩处，更应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

所谓物质责任，就是责令读职犯罪的人承担物质赔偿的责任，对他们实行一定的物质惩罚。这种惩罚包括追赔、罚款、没收财产等等。事实证明，这对保障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物质利益不受损失，使违法者在物质上不承担任何实际利益，严明党纪国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在各个经济部门中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各种岗位责任制，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也正在健全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正在显示出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了保卫国民经济的发

展，今后对于所有违反责任制、破坏经济合同、破坏国民经济计划并造成损失的读职行为，也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在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座谈会上

乌兰夫部长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在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各位委员，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是要狠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而且各条战线，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决存在的问题，要做的工作很多。记得去年八月间，我在一次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上曾说过：我们党的赎买政策是有始有终的，说话是算数的，但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要有一个过程。这就是说，请工商界的朋友放心，党的政策是会落实的。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朋友，就在党的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就已经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作出了决定，包括：退还被查封的巨额存款和其他财物；恢复和补发被扣减的高薪，等等。这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同志伟大红旗，坚决拨乱反正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我相信，这一措施必将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支持，得到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热烈拥护，从而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工商业者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

各位朋友，各位同志，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党的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把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彻底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奋勇进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极其光荣、极其艰巨的任务，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一个伟大历史转折。实现这样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宏伟事业，就更加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求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在新的长征途中，作出新的贡献。

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战略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一项重要重大的政治任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在一九六六年“四人帮”之后，在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中，就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在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和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也都明确规定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两年多来，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的一整套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积极性也进一步调动起来了。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形势大好。但是，还不能适应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形势的需要。

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加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战略和策略问题。但是，过去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遭到严重破坏，至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未完全肃清，人们思想上的余悸也还未消除，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也因此遇到种种障碍和阻挠。下面，我想着重谈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指出：官僚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又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民主的方法和赎买的政策，逐步引导他们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达到消灭这个阶级而改造这个阶级的目的。

大家亲眼看到，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这个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和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一、仅仅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就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保持了社会安定，市场稳定，生产力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持续发展了；第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经过革命实践的教育和政治学习，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林彪、“四人帮”迫害和摧残下，总的说，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绝大多数人热烈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热情也很高涨。坚持无产阶级反动立场、仇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是极少数。这一切雄辩地说明，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完全是正确的，在国内、国际都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同志所说：毛主席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互相勾结，推行了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他们炮制所谓“黑线专政”的反动谬论，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成绩；在组织上，不仅对党的各级战备部门横加摧残，而且整垮各级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众所周知，解放后十七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总理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说，每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每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中央统战部是推行党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有力助手。它和各级方级统战部，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上是认真的，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从中央到地方，从事统战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的统战工作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工作中心，成绩也是主要的。我们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光辉思想，结合实际，认真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

林彪、“四人帮”还极力鼓吹什么“全面专政”论，打倒一切，从根本上颠倒了敌我友关系。不仅把成千

上万的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迫害广大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迫害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爱国朋友们，他们制造种种罪名，甚至不讲任何理由，就把爱国朋友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士，戴上“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的帽子，进行揪斗，实行专政，甚至迫害致死。他们以各种诬陷不实之词，制造了不少冤案、假案、错案。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又说：“……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把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路线批倒批臭，肃清流毒和影响；并且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事实求是、有根有据的精神，抓紧复查，把林彪、“四人帮”强加在爱国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人们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林彪、“四人帮”还恶毒诬蔑和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什么“投降主义”，他们任意篡改，扣减工资，极力破坏和篡改党的赎买政策和其他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根本原理。但是无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采取什么方式和措施来“进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改变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就必须结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除没收一切逃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且认为，可以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也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论粮食税》）。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和我们党早就有过合作的历史，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再加上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需要尽可能地利用民族资本，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采取民主的方法和赎买的政策呢？从整个阶级斗争的观点上看，我们对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付出一笔赎买金（马四马分配、定息和高薪等），是为了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接受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很清楚，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赎买，这是无产阶级的一项坚定的阶级政策，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愿意接受的一种办法。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六九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批示照发的一个文件，就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然具有两面性，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是能够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对他们要坚持贯彻“团结、批评、教育”和赎买的政策；一九七一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又亲自批发了一个关于处理被查封财物问题的报告，要逐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政策。但是，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却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竭力对抗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就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前一个文件下达后的一个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便匆匆窜到上海，连续召开所谓“落实政策”的座谈会，恶毒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胡说什么：“二十年来还没有学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搞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大清楚。”他们强调“上海特殊”，要搞什么上海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所谓“样板”，并两次炮制了“试点”报告，企图骗取党中央的批准。但是中央没有批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和上海的余党，迫不及待地在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召开了全市所谓“落实政策的讲用会”，叫嚷“中央没有批，怎么办？不能等”，硬把他们背着党中央搞的一套照搬了去，把民族资产阶级人们的部分高薪砍掉，把国务院关于处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问题的规定改变掉。他们这一套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东西，不只泛滥上海，而且流毒全国，在港澳和国外也造成极坏的影响。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所规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广泛地听取了工人群众的意见，最近作出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政策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我简要地讲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银行存款、公债、金银和其他财物被查封了。被查封的存款，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按照既定的赎买政策付给的定息，其他被查封的财物也大多是生活资料。这些都是属于宪法保护的合法收入和私产。任意把国家已经发给的赎买金抄走，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宪法所不能允许的。过去几年，各地虽已陆续发还了一部分被查封的存款和其他财物，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尚未发还，主要是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大中城市。中央这次规定，他们被查封的存款，无论金额大小，全部解冻，一次发还，并且按照银行的规定，发给利息；本人已经去世的，退还给配偶。至于其他财物，自不待言，也要抓紧落实、发还。如果发现有人贪污、盗窃了被查封的财物，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二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普遍被扣减了高薪，或者只发生活费。高薪是党对

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一个方面，让他们保持比一般工人、干部高一些的生活水平，目的就是要促使他们逐步地、不太勉强地改造成劳动者”。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粉碎“四人帮”前后，不少省、市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被扣减的工资已经基本上予以恢复，但也有些省市没有恢复，或者只恢复未补发。中央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减了薪金的，一般应当恢复他们原来的薪金，并且补发过去被扣减的部分。

第三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中城市把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私人房屋占用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明确属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个人所有的房屋，应当受到宪法保护，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中央规定，这种私人房屋应当仍然属于他们个人所有，被占用了的私房，应当归还给他们。在处理中，如存在实际困难，可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予以解决。

第四个问题。公私合营高潮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作为资方代表，在企业中安排担任了各级行政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企业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不加区别地把绝大多数人下放车间或门市部从事体力劳动，使相当一部分具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才干的人，用非所长、用非所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是不适当的；这同当前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不适应。大家知道，为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下，从国外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聘请外国的专家，为什么对经过了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明确属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个人所有的房屋，应当受到宪法保护，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中央规定，这种私人房屋应当仍然属于他们个人所有，被占用了的私房，应当归还给他们。在处理中，如存在实际困难，可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予以解决。

第五个问题。公私合营以来，我们即组织在企业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参加企业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评比活动。实践证明，这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都是有利的，对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改进经营管理，也有积极的作用。为了促进他们继续接受改造，调动他们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我们认为，应当组织他们和职工一起参加劳动竞赛和评比；对于生产劳动和工作表现好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以表扬和物质奖励；对政治上表现好、有突出贡献的，可以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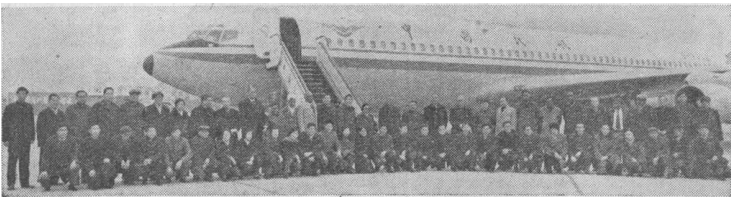
第六个问题。关于他们的生活福利待遇等问题，过去国务院都有规定。但有些规定，因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没有认真执行，有的由于情况变化，需要作相应的修改。一九七七年国务院对股金在二千元以下和二千元以上的工商业者的病假期间工资和医疗待遇，加以区别对待，现在定息已经结束，他们在企业中工作年限的年限，一般都已经超过十年，继续执行原来的规定已不适应。现在在党内规定，对他们病假期间的工资，一律根据生活困难情况或病假期间长短，按照本人的工资发给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已经按照职工待遇办理的，不变。医疗待遇，则参照所在企业单位职工的办公办法。关于非因死亡待遇问题，按一九五七年国务院的规定，在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非因死亡待遇，要比后来一九六二年国务院规定的退休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死亡待遇低，这是不合理的。现在规定，都参照所在单位职工的待遇办理。以上这两项规定，国务院将会发出相应的通知。至于退休问题，应当继续执行一九六二年国务院的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地方没有按此规定办理的，现在要改正过来，被扣减的退休费，应当补发。

第七个问题。按国家的政策，定息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已经结束。现在有些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求领取在此以前应领而未领的定息，行不行呢？中央认为，可以。

第八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党中央重申：要坚持重在本人表现，不能唯成分论。在入党、入团、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能歧视他们。

中央关于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的决定，主要是这八个问题。现在已经在下执行。我们各级统战部，应当协同各有关部门，把这项工作做好。但工商界的朋友们也还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就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一部分人还藏着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因此，不能设想，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会那么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阻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在职工、干部中大力加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宣传，并检查、督促落实党的政策，同时，我们也希望，民建会、工商联组织的负责人，象过去一样，协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一方面，在落实政策中，你们发现有什么问题，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怎样，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如实反映，不要反映，怕反映。另一方面，协同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工作。我们相信，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大多数工商业者会正确对待党的政策，但也不可讳言，总有一些人会不同程度地发生这样那样不利于自我改造，不利于社会，不利于下一代教育的事情。因此，我们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

各位委员，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全党全国实现伟大战略转移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李先念副总理回到北京。邓小平、耿飽、王震、陈慕华副总理，李井泉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摄

决心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献计尽力

在京的部分劳动模范、国务院参事和文史馆员、民盟部分成员、民促部分成员和教育出版界人士分别举行春节联欢会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各条战线劳动模范发扬光荣传统，抖擞精神大干快上，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这是在北京部分劳动模范今天在春节座谈会上表示的共同决心。

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室今天充满了新春佳节的欢乐气氛。在北京的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科技、卫生等行业的劳动模范一百五十人欢聚一堂，互相慰问的新春问候。他们当中，有著名的劳动模范吴运铎、孙云龙、郝建秀、郭树德、张百发、李瑞环、李昌安、陈福汉、梅月兰等。

春节劳模座谈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合召开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纪华，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等，出席了

座谈会。余秋里、李纪华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倪志福同志代表全国总工会向劳动模范们致节日的祝贺。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国务院办公室于今天下午邀请国务院参事及文史馆员聚会，共庆新春佳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了聚会，亲切会见了国务院参事及文史馆员，并设宴款招待他们。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一百多位民盟成员今天在北京饭店举行春节联欢会，畅谈祖国安定团结、齐心干四个现代化的大好形势，决心在新的一年里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献计尽力。

联欢会是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民盟北京市委员会联合召开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南在讲话

中要求民盟同志在新的一年里为祖国的四化和台湾回归祖国做出新贡献。

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和童第周、闻家驊、费孝通、钱伟长在茶话会上发了言。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组组长周扬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小鹏先后讲了话。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民主促进会部分成员和教育、出版界人士两百多人今天出席了民主促进会中央举行的春节茶话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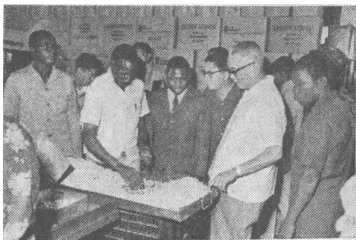
民促中央主席周建人作主题发言。老教育家董纯才、老作家谢冰心在会上讲了话。诗人赵朴初在会上朗读了他的新作。

民促中央副主席杨东莼、叶圣陶在会上作了书面致意。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在会上讲话。

李副总理访问亚非五国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先后访问了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和巴基斯坦，受到热烈欢迎。



一月九日，李先念副总理在莫桑比克对外贸易部长蒙贝的陪同下，参观马普托普鲁卡糖厂。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一月二十日，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到达伊斯兰堡，在机场受到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席、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和夫人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一月六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陪同下，到达桑给巴尔岛参观访问，在机场受到坦桑尼亚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的热忱欢迎。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一月十九日，李先念副总理在金沙萨举行招待会，邀请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严重步骤。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托恩首相和夫人在京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和夫人等贵宾，今天晚上由康世恩副总理陪同，出席了文化部举办的文艺晚会，观看了中央歌舞团演出的文艺节目。

拉姆古兰总理接见我技术组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一月二十四日接见了中国技术组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这个技术组是应毛里求斯政府的邀请，前来最后确定中国援建的新机场大楼初步设计方案的。技术组在一月二十日到达这里后，二十二日受到毛里求斯经济计划和发展部长古尔布伦的接见。

庆祝中法建交十五周年 我驻法大使举行午餐

新华社巴黎一月二十四日电 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二十四日在大使馆举行午餐，庆祝中、法两国建交十五周年。

法国外贸部长让·朗斯奈、德尼奥和韩克华大使在宴会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回顾了中法之间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并表示要进一步加深中法人民之间的友谊。

尼外交大臣会见边界检查委员会我方首席代表

新华社加德满都电 尼泊尔外交大臣克里希那·拉杰·阿里亚尔一月十五日在加德满都友好会见中尼边界检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曹胜功。尼中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首席代表比什瓦·普拉丹和尼泊尔大使曹胜功也参加了会见。中国代表团是参加中尼边界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一月九日到达加德满都的。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回国

新华社上海一月二十四日电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圆满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演出，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谊，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上海演出了三场日本古典的传统剧目，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称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二十三日晚观看了日本艺术家的演出，热烈祝贺使节团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互相交流了经验。

发展日中友好关系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东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在日本第十八届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他就任首相后的第一个施政方针演说，阐述了大平内阁的内外交政策。他在谈到日中友好关系时，阐述了大平内阁的内外交政策。他在谈到日中友好关系时，阐述了大平内阁的内外交政策。

大平首相在谈到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时首先强调说：“我国外交的基调，当然是维持和加强日美友好关系。”“日美两国应当进一步加深相互理解，同时在当前的经济问题上必须予以协助解决，以有益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扩大。”

大平在谈到日本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时说：“进一步推进同作为我国的邻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以及苏联的友好关系，也是我国外交的最重要的课题。同苏联之间虽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北方领土问题，但要耐心地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争取缔结和约。”

大平接着强调指出：“去年秋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今年元旦建立了外交关系。期待这一连串的外交上的展开，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重大贡献。作为我国来说，也要沿着这一方向，踏踏实实地发展日中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据新华社东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日本外相福田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在第十八届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外交演说时说，日本“必须充分发挥自己所具有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主动地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福田外相在谈到亚洲问题时指出：“最近围绕着柬埔寨所出现的事态，是极其令人遗憾的。我们强烈希望避免干涉内政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

福田外相在谈到朝鲜半岛地区的局势时说：“为了给朝鲜半岛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首先恢复南北对话是必要的。”

福田外相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今后‘将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致力于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并发展友好关系，准备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以使能实现新的日中关系，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福田外相在谈到日苏关系时说：“为了把日苏关系置于真正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北方四岛归还祖国之后，缔结和约，是必不可缺少的。”

日本自民党代表大会通过运动方针 强调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关系

据新华社东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一月二十四日在东京举行了第三十六次定期代表大会。自民党总裁大平正芳在会上讲了话，大会还通过了包括要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等内容的运动方针。

大平在谈到日中关系时说：“去年秋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今年元旦建立了外交关系。期待这一连串的外交上的展开，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重大贡献。作为我国来说，也要沿着这一方向，踏踏实实地发展日中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大平接着强调指出：“去年秋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今年元旦建立了外交关系。期待这一连串的外交上的展开，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重大贡献。作为我国来说，也要沿着这一方向，踏踏实实地发展日中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大平在谈到对东南亚的关系时说：“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 and 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一所所有二十万学生的大学

——曼谷甘亨“开放大学”见闻

本报记者 胡思升 史宗星

初到曼谷，就听到泰国朋友说：这里有一所“开放大学”，有二十万大学生在校就读。这个消息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如果一个大学能容纳二十万学生，创办于二十年前，这所大学，不就可以培养出上百万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的青年人才吗？这对于任何一个要建设自己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去年十二月中的一个上午，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访问了这所由泰王亲自创建者的名字命名的甘亨大学，所见所闻，给人以一种新鲜的感觉和有益的启示。

启发人的“开放”

在一间椭圆形的会议室里，代理校长、副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相当于系主任）向我们热情地介绍了学校诞生、成长的历史和现状。

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和成长，往往要回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大多数人的愿望。在泰国，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是，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不能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这一大批向隅者（以及他们的家长）处在失望的地境之中。他们热切要求接受高等教育，以便能物色一个较好的待遇的职业。但是，全国只有二所大学，每年只能招收一万三千名新生，而每年的中学毕业生人数达到二十万，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还在与年俱增，估计到一九八〇年将达到二十八万人。曼谷甘亨大学，应运而生。

一九七一年一月，泰国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考察执行开放政策的各种大学。他们为纽约州立大学这样一所开放

大学所吸引，并借鉴了该校的一些实践经验。一九七一年二月，甘亨大学正式成立，并宣告：凡是十二年制和十年制中学毕业及同等学历者，均可免试入学。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甘亨大学门庭若市，成为一所闻名全国、为一切有志于求知的人敞开大门的唯有一所大学。

人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不必通过考试，不论年龄大小，不论有无职业，只要本人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并申请入学，均可办理注册手续成为本校的学生。这怎么能吸引就有上千万的人呢？因此，学生人数逐年剧增。去年注册的新生就有八万六千人，加上原有学生，就学人数已达十七万一千多人。今年的新生预计将达到二十万人。学生年龄最大的七十二岁，最小的仅十六岁。父子同窗，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在校学生中，包括有政府官员、国会议员、部队军官、部长夫人、店员、小贩、看门人等各个阶层的人。当然，大多数是中学毕业的青年人。

全校分为工商管理、经济、教育、文学、法学、政治科学、理学等七个学院，下设十几个专业，每学期有六百八十六门课程，学制四年，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不能按时毕业的学生则允许延长到八年。

学校不为学生提供宿舍。学生们一半住在曼谷，一半分散在全国各地。一年级新生全部不来校上课，而是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时间，通过十二个中心广播站对各科学生进行教学。住在曼谷的学生全部走读，定时到校通过闭路电视上大课。参观过程中，我们曾到校园里摆着上百个小摊，出售各种饭菜、小吃和饮料。学生们在中午休息时随时能买到自己爱吃的食品，价格比较低廉。

学校定期举行考试。这个学校特点之一是：入学容易考试难。考试时，学生分批来曼谷统一进行。由于学生多，考试科目多，考试时间往往持续一个多月。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组织工作，但据说每次考试都并非有奇效，从未发生过舞弊。如果经过多次考试仍然不能达到应有水平的学生，予以除名。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被除名的达四万五千七百多人。

当我们问及教育质量和毕业生的待遇时，主人介绍说，该校毕业生同泰国其它大学毕业生享有同等待遇，学校发给大学毕业证书，成绩优异者由国王亲自授予各种学位。主人送

给我们几本画册，其中一本的封面就是国王向该校学生授学位的彩色照片。“开放大学”创办八年来，已经毕业四届，近一万人。

“开放大学”的主要教学手段和设备是闭路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一九七一年该校创办时，仅有两套闭路电视，一九七七年则增加为七套，电视接收机增加到一千台，电路连接各个教学大楼，有六个频道，每天广播六小时，全国各大学电视接收机，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先进的教学设备

“开放大学”的主要教学手段和设备是闭路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一九七一年该校创办时，仅有两套闭路电视，一九七七年则增加为七套，电视接收机增加到一千台，电路连接各个教学大楼，有六个频道，每天广播六小时，全国各大学电视接收机，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万多学生可以同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宽敞、明亮、整洁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课桌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十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椅子。我们作了第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电路接好后，只见几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师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师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图的图表和符号也能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国外医药简讯

诊断早期肺癌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用了维他命B12的装置



